学習時報

STUDY TIMES

2017年1月30日 星期一 | 第958期 |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 网址: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137 代号 :1-267

领袖家风 系列

周恩来同志的家风

□ 廖心文

周恩来十分重视家风建设。他没有亲生孩子，但周家是一个大家庭，像普通家庭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就业上学等问题。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家风，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时时在考虑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他不但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亲友长辈，以减轻地方政府和社会的负担，还主动担负起教育引导周家年轻一代的责任，在大家庭内部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家风。

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展板上，醒目地写着“周恩来的10条家规”，家规中要求：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车；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10条家规，是周家晚辈根据周恩来平时对他们的教育总结出来的。周恩来没有写在纸上，而是写进了后辈们心中。

从这10条家规可以品出，周恩来对亲属晚辈的要求十分严格，也十分具体、细致，细微中透着关怀。周尔均是周恩来的堂侄、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在部队被批准入党，很兴奋，立即把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很快，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写了回信，在祝贺的同时，提出三个必须：“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努力，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实践为要。”周尔均深有体会地说：伯伯对我们的要求“看似无情胜有情”；“他对我们晚辈的严是一种真正的爱，发自内心的爱”。

周尔均的体会是十分准确的。周恩来虽然对亲属要求很严，但却是一个充满温情、恪守孝道的革命者。他年轻时在海外求学，因曾经照料过自己的八叔父去世悲痛万分。在战争年代，他把父亲接到身边养老送终。装着父亲遗像的皮夹，他始终贴身带在身边几十年。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他想起早已去世的母亲，含着眼泪对记者说：“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细细品读周恩来的10条家规，有两点核心内容。

一是决不允许家人享受任何特权，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周恩来曾对晚辈们说过，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我们周家过去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这一代要好好地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周恩来要求亲属在外面不能讲同他的关系，不能享受特权，要完全做一个普通人。周恩来不仅提出要求，并且严格监督，管得很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参加工作不久，组织上把她从基层农村小学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找周秉德谈话，问她：“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顾你进城的?”周秉德回答说：“不是。是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小学里的党员很少，所以把我抽调上来。”周恩来听后说：“哦，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呀！但你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为好。”周秉德知道伯伯叮嘱她的含义，一直严格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20世纪60年代，为减少北京市人口，国务院曾出台一个政策：夫妻双方如一方在北京，另一方在外地，在北京工作的就要调往外地。当时，周秉德在朝阳区委工作，她丈夫沈仁骅在西安部队工作。领导找周秉德谈话做动员。周秉德说：不用动员了，四个月后，我休完产假就调往西安。周秉德调到西安后，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后来又随丈夫去贵州山沟里工作了四年。周恩来对侄女的做法很满意。要求后辈不搞特殊，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二是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对学业和工作的选择，都不要先考虑自己，而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以周恩来的侄子周秉钧和侄女周秉建为例，他们都曾经为参军问题受到伯伯的关注。对周秉钧，周恩来希望他穿上军装；对周秉建，周恩来则要求她脱下军装。这一穿一脱，体现着周恩来严格的家风。

1961年夏，周秉钧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同时还参加了空军到学校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事后，周秉钧向伯伯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在谈话中，周恩来问了一句话：“那大学就不考了吧?”周秉钧说：“考还是要考一下。”周恩来又问：“既然决心参军，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呢?”周恩来的意思实际上是让他不要参加高考了。为什么呢？周恩来对周秉钧说：“现在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不足，政府研究决定，今年只在城市征兵，不到农村征兵，复员兵也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样不但加强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也减轻了农村对城市商品粮的负担。”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周秉钧根据国家需要参了军，被空军录取为飞行员，飞了近20年战斗机，在部队工作了30年。周秉钧后来才知道，在当年召开的恢复生产发展的会议上，周恩来讲话希望干部们带头送子女参军，以保证农村劳动力。他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儿子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被周恩来动员参军的另一个城市青年是他长征时的警卫员龙飞虎的儿子。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赴内蒙古插队落户。两年半以后，周秉建应征入伍。穿上军装的周秉建怀着高兴的心情回北京过新年。回到家不久，她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当面去汇报情况。周秉建立刻敏感地想到，是不是两位老人误以为她是“后门兵”。她到西花厅时，周恩来正站在院门口等她。看见周秉建，周恩来很高兴，迎上去拉起她的手，边走边说：“小六，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周秉建感到委屈，勉强地吐出一个字：“能。”在饭桌上，周恩来耐心地给她讲道理：“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中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事后，周恩来又派他的秘书专门到部队了解周秉建是怎样去当兵的，确认周秉建是按正常程序当的兵。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工作，周秉建心情愉快地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几天后，北京军区有车去内蒙古，周恩来再次在西花厅约见周秉建，说了很多鼓励她的话。那天，天下着雪，气温很低，周秉建脱下还没有穿热的军装，揣着周恩来温暖的嘱托返回内蒙古。参与处理这件事的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回忆说：“当时，我觉得周总理对自己的亲戚太严格了。过了一段日子，我才体会到他这样做的良苦用心。”那阵子，一些干部，包括周恩来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在想方设法让子女离开农村去当兵，这对稳定知识青年队伍，对整个国家的大局都是不利的。赵炜说：“周总理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诫大家。”

周恩来与邓颖超

对周恩来严格的家风，不仅他的晚辈们感触颇多，邓颖超体会更深。她曾经感慨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一辈子，但从来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他们结婚后曾经协商，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间，他们都遵守了这个约定。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人对周恩来说：根据邓颖超的资历和她对革命的贡献，应该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职务。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她。对周恩来这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邓颖超将其看作是一种严格的家风，体现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她毫无怨言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家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组成部分。周恩来建立的严格家风和具体家规，不仅当时对各级干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延安时期的红色春节

□ 赵耀宏

农历新年，是中华民族最为盛大的节日，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与真诚期许。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理念与延安古老的民俗民风相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红色春节文化，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红色记忆。

将新思想的宣传教育与传统民俗民风相结合，推动党的政策主张走进百姓内心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民风淳朴，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春节民俗活动，一首民谣在当地流传甚广：“二十三祭灶天，二十四写对联，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在迎接新年到来的过程中，当地百姓赋予这些习俗浓郁的地域特色，营造红火热闹的喜庆气氛，也虔诚地将希望寄托于未知的神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对民俗形式多予以尊重，但对其内容则加以改造，以提高百姓文化认知和政治觉悟为目的，利用旧形式宣传新思想，开启了走革命道路谋幸福生活的新理念。

年画和春联，是人们用以表达美好愿望最直观的载体。传统旧年画以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的神仙悍将为主角，门神以钟馗、秦琼、尉迟恭为主。1938年年初，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木刻年画《五谷丰登》《保卫家乡》发给农家张贴，开始了新年画的创作并逐步推广扩大。1942年，鲁艺美术部成立年画研究组，不断改进年画创作工作，在技术上运用民间形式，力求适合当地民众欣赏习惯；内容上则以歌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充分展示边区军民的新生活新风貌，创作出《保卫边区》《养娃娃讲卫生》《大战平型关》等一批批广为群众喜爱的年画作品，深受群众喜爱。

春节的对联，从内容的选择到张贴的时间，在传统延安民俗中都有特殊要求，与年画相比，寓意更深且讲究个性，更能传达民众关切，也更具宣传教育价值。在边区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延安民众自发创作了许多以抗日战争与现实生活为背景的新春联。例如：自由平等除旧岁；民主政治过新年。过新年坚持抗战到底；除旧岁反对妥协投降。有牛有地有劳动家家足食；自种自纺自织布个个丰衣。这些春联遍布边区，散发着浓厚的节日气息，勾勒出延安人民内心的自信与激情，切实起到了识字课本与政治课本的教育作用。

1947年，当中共中央离开延安时，新年画、新春联已经取代旧年画、旧春联进入延安百姓家，而年画、春联里蕴含的思想也深深印在了延安人民的内心深处。

将革命文艺发展方向与民间艺术形式相结合，兴起党领导的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

陕北有许多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打社火、闹秧歌、说书、唱酒曲等等，是欢庆节日或婚丧嫁娶中广为运用的表演方式。其中闹秧歌群众基础最为深厚，集舞蹈、歌唱、角色扮演为一体，内容完全源自农民生活，热烈奔放不失诙谐幽默，是延安传统春节文化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要从大年初一延续至元宵节。延安时期，秧歌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成为延安红色春节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界掀起文艺大众化的新高潮，一场“新秧歌运动”应运而生。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指引下，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学习和采用传统陕北秧歌的艺术形式并加以改造，以边区军民实际生活为主题，创作《拥军花鼓》《兄妹开荒》《摇花篮》等一批新秧歌，于1943年春节期间亮相延安街头。鲁艺组成150人的庞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等地进行春节巡回表演；为配合“双拥运动”，延安各界举行了军民联欢会、拥政爱民大会，延安文艺界在金盆湾、南泥湾举行劳军慰问大会，新秧歌剧的演出成为所有活动中最抢眼的文艺节目，引发观众强烈反响。一场在延安东乡罗家坪的演出中，当打花鼓的演员唱到：“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时，周围观看的千万群众齐声合唱：“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场面热烈感人。以鲁艺老师王大化和一年级学生李波表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为例，一出两人出演的短小剧目，将浓郁的乡土气息、新型农民形象与欢乐的劳动场面融为一体，生动活泼又富于情趣，在延安各阶层民众中引发了轰动效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春节演出的一举成功带动和促进了延安新秧歌运动的蓬勃发展。1944年春节，延安的工厂、部队、学校组织的秧歌队多达27家之多，上演了150余个节目，延安城内鼓乐喧天，万人空巷，一派欣欣向荣的节日气氛。鲁艺表演的《白毛女》等精品剧目更是连演数十场，场场轰动，“鲁艺家的秧歌队”被认为“最好看”，成为延安军民心中最受欢迎的艺术家群体。

以“新秧歌运动”和春节秧歌演出的高潮为标志，延安春节的红色意蕴更加浓郁，一批党的文艺工作者成长起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呈现出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新气象。

领袖的爱民情怀与百姓对党的真诚拥护相结合，彰显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血肉关系

拜年，是中华民族的古老习俗，最能凸显辞旧迎新之际其乐融融的和美氛围。延安时期，最值得回味的拜年，发生在党的领袖与他们的农民朋友之间。

中央领导在延安期间，无论住在哪里，都与邻居们相处甚欢，春节期间总要彼此拜年，一起观看秧歌欢度新春。1943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得知枣园村有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且其中两位都是正月十五的生日，便决定在元宵节请24位老人来吃饭，为他们祝寿。当天下午两点，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大家，还一一给他们敬酒，祝老人们延年益寿，之后请大家观看电影《列宁在十月》，气氛欢乐，亲如一家。

延安的百姓每一年春节都要向中央领导拜年，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表达他们对党和政府的真诚拥护。1943年春节，延安群众到枣园拜年，秧歌队高唱“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秀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1945年，劳动英雄吴满有和儿子一起来给中央领导拜年，送来三百多斤重的家养大肥猪，毛泽东笑着说：“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临别时，毛泽东将自己的钢笔送给了吴满有的儿子。1946年春节，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代表到王家坪拜年，将写有“人民救星”四个大字的金匾送给毛泽东，秧歌队的伞头唱出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对党和领袖的热爱溢于言表。

1945年的大年初一，毛泽东一大早就带着两个警卫员前往枣园乡政府给群众拜年。据当年担任枣园乡乡长的杨成福回忆：主席来时，我们有些干部还没有起来，警卫员叩门说，主席来拜年了。主席一进门就问了三个好，说新年好，身体好，工作好。并提出想去给枣园村群众拜个年。由于群众居住分散，最后一户请来一个代表，在乡政府开了一个新年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询问群众生活情况，征求大家对政府的意见和了解群众有什么困难，当群众反映儿童上不了学，没有教师，毛泽东即刻答应派教师解决枣园村儿童上学问题。第二天，延安市西区老百姓、警备团、机关代表、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一百余人在枣园给中央领导拜年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接见了大家。毛泽东发表讲话，首先讲了去年一年的成就：“靠大家努力，做出不少成绩。”其次谈了新的一年要办的几件事，一是干部群众要更合作、更团结；二是希望增加粮食，多交公粮；三是要多纺纱织布；四是要讲卫生，把娃娃养好。这样的谈话，无论总结成绩还是谈及希望，毛泽东对情况了解之细致，对百姓关爱之周到，着实令人动容。

从这些感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味到延安时期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而这种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正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能够战胜艰难险阻，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领导革命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基本法则和奥妙所在。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